

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海贸易

李 静 李志俭

辛亥革命前，北海地区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，当地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像火山一样喷发。民国政府的成立，虽然客观上为北海当地资本主义发展开拓了道路。但是，民国以后原清廷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没有废除，严重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，北海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港口城市。

1905年，我国掀起反对美国排华运动。

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矛头，鲜明地指向帝国主义和清廷，北海亦发生了抵制美国面粉的风潮。当时北海百姓出于爱国，在街头巷尾谣传“花旗面有毒”。结果，店铺的美国面粉卖不出去，连用面粉制成的北海月饼亦无人问津。据当时《时报》记载：“自抵制美之风潮起，花旗（即美国）面粉大为滞销。”结果，沉重地打击了美商。次年，北海进口美国面粉由8万担下降到3600余担。这种抵制运动，不仅使美商震动，而且代理美国商务的英国驻北海领事府官员亦感到不安。英国公使向清廷表示：“华人禁止美货事，非但美商受损，凡各国商务均有危险之虑。”并扬言如果清廷不制止，马上出兵动武。殖民主义者的叫嚣，吓坏了清朝官员，光绪皇帝下诏给各级官员取消抵制美货运动，谓：“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，滋生事端，即行从严查究，以弭隐患。”两广总督岑春煊亦下令廉州官府“出示禁谣”，把抵制美货运动镇压下去。1896年，北海进口洋货价值为315万两关平银，1905年和1906年北海进口洋货分别下降为184万两和159万两。洋货进口量比以前减少，除了当地生产遭到破坏、人民生活贫困购买力下降以外，更主要的因素是当地人民反帝和抵制洋货运动的高涨。

1907年农历3月，钦廉发生旱灾，饥民饿死路旁的现象屡有发生。清廷为了《辛丑条约》赔款，下令各地增税。廉州、钦州官府不顾黎民疾苦，仍然摊派苛捐。结果，“钦属那丽、那彭、那思三乡抗捐酿成民变”，愤怒的群众捣毁税卡，把斗争矛头指向官府。与此同时，廉州的群众对帝国主义分子在北海胡作非为早就不满，现又因清廷为了赔款加重捐税，便把愤怒迅速转移到外国教士身上，自发地起来捣毁英国、德国教堂。当时，廉州镇发生“教堂被焚，教徒被杀”的事件，当地人树起了反对洋教的旗帜。对此，时任北海关税务司阿歧森在1907年10月19日致赫德的函件中记载：“这一带所以动荡不安，或多或少地与反清情绪有关系……地下的火山正在酝酿着，可能爆发出来，使周围地区遭到毁灭。”当地人民群众反帝反清的怒潮，确实像火山一样爆发。据时任北海关税务司爱尔学记载：“当英国领事昨天下午收到廉州的雇员来电，报告英国教堂被毁，教士都逃走的消息时，大家都吓了一跳。后来又收到电报说，德国教堂也被毁了，英德两国教士都在廉州府衙门安身。下午6点钟在法国领事馆召开会议，各国领事决定把妇孺送上英轮。关员都领了海关的来复枪，其他一些人的武器由各领事馆供给……预料英法两国的军舰不久就要来了。”当时，英国派来巡洋舰“舞鹤”号，法国亦派巡洋舰“河内”号抵北海港碇泊，进行军事恐吓。清廷闻讯慌了手脚，命令廉州官府执行“保教抑民”的政策。一方面追查和捉拿参与拆毁廉州德国教堂的市民，另一方面将廉州街的“同善堂”赔给德国，又赔偿6000两白银，才了结了此案。

帝国主义为了维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，不惜帮助清廷镇压民众，自然遭到北海及内地民众的反抗。一方面，他们继续抵制洋货进口，使北海“入口贸易，比上年大有减色”；另一方面，则组织了“万人会”反抗清廷和外国教会。这种斗争撼动了清朝统治的基石，光绪帝下谕：“近年各省时有匪徒啸聚……事起一隅，动关全局。”要求各地加强镇压群众的自发性反抗斗争。于是，两广总督“派郭人漳、赵伯先二人各带新军三四千人”，抵钦廉进行镇压。然而，星星之火，已变熊熊烈火。

全国已进入辛亥革命的前夕。郭、赵与同盟会有联系，孙中山利用这个机会，在钦廉一带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。第一次，派王和顺率部攻防城、钦州、灵山；第二次，孙中山和黄兴亲率“百数十人袭取镇南关……而与龙济光、陆荣廷等数千之众连战七昼夜”；第三次，孙中山又派黄明堂“以二百余人出安南，横行于钦廉、上思一带，转战数月”。孙中山在钦廉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，客观上由于敌人势力太大，加上郭人漳违背诺言，反过来镇压革命，结果失败了。军阀郭人漳两手沾满革命党人的鲜血，爬上了钦廉道台的官阶。

二

1908年，清政府行将崩溃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北海口岸及内地，散勇肆行劫掠。社会不安定造成生产下降，人民生活贫苦不堪，商业自然萎缩。于是，北海对外贸易便大受影响。货运量减少，北海航运业开始萧条。北海德商捷成洋行，将原有轮船“常川”号等船，“改走香港、汕头航线”。因而，1908-1910年抵北海外轮逐年减少。1910年，北海口岸及其内地发生严重旱灾，接着又发生鼠疫。3-5月，鼠疫迅速蔓延，北海及附近死亡人数达1000人，廉州同遭此祸。北海商家和居民人心惶惶，纷纷迁徙他乡，屋宇多空，市肆尽闭，街道冷冷清清。对此，北海关档案资料亦记载：“观以上各情，商务受害之故，易想见也。进口货暂行停办，其时多人亦无敢携带土产来此者，诚恐染疫而返也。”天灾人祸，给北海商业带来了巨大的阴影。

广西内地的货物，转由越南海防输入。结果，北海“不但进口货大受影响，即出口货亦然，夏季格外短绌”。可怕的鼠疫，使北海对外贸易相对萎缩，对北海航运业极为不利。1910年，北海入口外轮仅为196艘，比1907年减少了131艘，几乎下降了40%。1911年，北海对外贸易逐渐恢复正常。据《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（1902-1911年）》记载，为恢复发展北海商务，当地官府和百姓“已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改善这地区的公路”，先后修筑了北海经合浦至灵山、钦州、安铺的公路，客观上满足了北海扩大商务的需要。清末最后4年（1908-1911年），外商低价购走了水靛13.9万担、糖12.2万担、鱿鱼和墨鱼干1.2万担、干鱼咸鱼4万担、花生油8万担、生猪5.2万头，还有牛皮、花生、八角、桂皮、烟叶、水果等不计其数。这些农渔副产品，主要来自合浦、钦州、灵山、玉林一带，借以北海为门户，输往香港或海防中转。外商在此掠夺了大量原料，从中获得高额利润。因此，法、德、英、美等国十分注重经营北海，重视北海航运业，彼此进行激烈的竞争。北海法商洋行为了与北海德商捷成洋行竞争，“该船常由北海直驶赴港，不泊海口一埠”。北海商人则因捷成洋行的轮船经常中途行抵海口，耽误时日，恐出口生猪家禽等土货遭受损失，所以将土货大部分交给法商洋行的船只托运。结果，抵北海的外轮，“其法国船之艘数与吨数为最多，而德国船次之，似与法国船论较相去甚远也”。

另外，英国轮船亦抵北海装运食盐，运抵广州。荷国轮船亦继续来往北海与文岛（苏门答腊）

和新加坡之间。

1910年秋收期间，广西内地的大米由北海不断输往粤省和香港。“时值北海的米价，涨至每斤四十五文。”时任钦廉道台郭人漳企图从中趁机捞一把，谓北海商会私运米石出口，不但把出口大米全部收归官府，并且“将商会协理董事斥革”。此事发生后，北海商民异常愤慨，“一律罢市”进行抗议。罢市消息传出，马上震动香港。自从1879年起，香港市场的一部分生活资料，向赖北海输出供应。当北海举行罢市时，“香港市面传闻异辞尤为震动”。尽管北海市民的罢市行动遭到清廷的镇压，很快失败。然而，人民反对清政府的斗争，继续像火山一样酝酿着爆发。

1911年9月27日，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罗侃庭在廉州组织新军起义，并且占领了廉州府。10月初，革命党派人与北海商会联系，筹备组织北海起义。时值10月10日，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，革命的火焰很快烧遍全国，清王朝迅速崩溃。据《合浦县志》（民国版）记载，当年10月12日驻钦廉地区的清军趁革命党人在廉州力量薄弱发动复辟，“烧西门内外街市，大肆掳掠，有室皆空”，廉州镇成为兵灾之地，广大百姓惨遭一场洗劫。此时，北海亦战云密布。盘踞在北海的帝国主义分子担心动乱，于是“英德法兵舰各一艘驶至北海港”，借口保护领事府、海关、洋行、教会，派兵在北海登陆。由于反动势力强大，同盟会的革命党人只好分别在廉州、北海撤退，抵省城广州找同盟会求援。清廷原驻北海的第二十一营兵勇，亦趁机作乱，进行反攻倒算，在北海，“先掠外沙货船然后洗劫商埠”。于是，北海告急。

此时，胡汉民已在广州成立军政府，闻廉州、北海发生叛乱，便派黄济川等人率领民军从广州乘兵舰抵北海港登陆。黄济川组织敢死队发起冲锋，将叛军打败，“尽缴乱兵枪械，诛其管带”，很快便收复了北海、廉州。接着，胡汉民向北海发出通电，“要求本地的旧文武官员，同属国民，自应照常办公，所有地方治安及属内外人生命财产，请力任保护”。北海地区许多本来与革命无缘的官僚、政客、士绅亦纷纷跑到革命的旗帜下，造成了鱼龙混杂的情形。但也反映出当时辛亥革命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北海民众为庆祝革命成功，于11月14日全市大放鞭炮，所有的船只和屋顶都降下清廷龙旗，改挂军政府的新旗。3天之内，珠海路一带就有500人剪掉了辫子。

三

原钦廉道台郭人漳亦趁机再次投机革命，摇身一变，自称钦廉军政府都督。为了收买人心，并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，他打电报给北海洋务局程芷，谓：“薪水局用照旧由军政府给发，并请代转达各国领事及税务司，以后交谊更宜亲厚，凡外人生命财产教堂，力任保护，本日以前清政府各条约均继续有效。”新军阀又投降帝国主义承认不平等条约，其目的是争取在北海的英、法、德等国领事承认“钦廉军政府”，并用关税向其提供军费来维持其反动统治。

1912年1月，为控制北海局势，争取外国的承认和支持，广东军政府派时任督办龙济光率领兵舰4艘，士兵2400名，由广州从海路抵北海，“恢复地方秩序”。此时，帝国主义列强想继续巩固其在华势力，便在北海关大楼顶上降下黄龙旗，悬挂五色旗，作为承认军政府的象征。同时，拨一部分税收款给新政仅充当军费。于是，广东军政府派重兵在北海驻防，使该埠恢复平静。结果，北海商业“实见复兴”，大量洋货又涌进当地市场。

1913年，民国临时政府在广东设广州航政局、琼州航政局和北海航政局。其中，北海航政局设在北海市珠海中路，“统辖钦廉各属——航政收入及船舶”。北海航政局成立后，英、法、德三

国驻北海领事在北海关召开了紧急会议，精心炮制了《北海关理船厅章程》，企图架空北海航政局，使其变成单纯收取船钞的税收机关，而由他们继续控制港口。北海航政局的职责，“是办理本港（自雷州半岛以西至越南北部交界海域，当时均属北海港区域）一切航政事务、海事、船检、船员登记及管理，督导航商，发展航业等”。然而，外轮进出港口报关检查，由英、法、德驻北海领事府和北海关掌握，北海航政局无权干涉，只能管理本国的民船。1914年，北洋军政府批准了《北海关理船厅章程》，北海港主权进一步丧失。对此，广东省政府交通厅官员亦承认：来往本省外船舶之管理，一部属本厅船政，一部属海关理船厅，“以重要航权，假手外人，实憾事之一”。当时，北海与廉州、博白、钦州、东兴和安铺之间的海上和内河运输，仍以民船为主，每年进出港口达3000余艘次。此外，北海与海南岛的海口、三亚等处的海上交通，每年亦有500艘次民船来往。因此，北海航政局船钞收入较多。例如1919年6月份，船钞为576.4两关平银，12月份升为1579.8两。当时许多有识之士认为，北海航业“将来再加整顿，及航海标识之建筑，则该处航政前途，定有可观”。

辛亥革命后，北海商贸一度恢复畸形发展。例如，1912年北海洋货进口估值仅为144万余两关平银，1922年上升为380万余两关平银，增长1.6倍，北海成为洋货充斥的市场。大量洋货涌进北海，打击了本地的工商业和农业。例如，水靛（一种染料）是北海港传统的出口商品，由于德国生产的化学染料大量打进国际市场，结果由北海出口的水靛销路滞塞，使廉州、博白、玉林、灵山一带种植水靛的农民几乎家家破产。对此，海关税务司亦承认：北海港的水靛出口，再次面临外国染料的竞争，“是年在这种商品的贸易上蒙受了重大损失”。许多农民在农村难以维持生计，便纷纷流入城市打工谋生。例如，北海市区街道在光绪末年原只有居民2万余人，在民国初却增为3.5万人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列强的航运势力马上卷土重来。北海港航运业，几乎一直由英、法所垄断。这些轮船，大多经香港或海防抵北海。例如，1912年，“所有各船由海防进口者，八十四艘。由香港进口者，四十五艘”。1916年，英轮在北海港开始称霸，其吨位占抵港船舶总吨位的83%。正如1917年1月29日北海关税务司巴博记载：“现本口输运权利，几乎全操太古洋行之手。”该洋行有“开封”“松江”等轮，每艘载重900多吨，定期由上海经香港来北海，借以接载输往香港、上海的货物。由于受到丰厚利润的刺激，各国轮船纷纷抵北海港口争揽生意。结果，次年进出港口轮船达408艘，吨位增加87%。除了太古洋行的轮船以外，法船“开平”“比美利”“华登”等，日轮“东庆丸”“芝班那”，葡船“海平”以及怡和洋行的“乐生”“壳士”等轮经常行驶上海、香港、海口、北海、海防之间，“循序往来，班期准确”。中国招商局和广东华侨轮船公司在本地商人的支持下，也派数艘轮船抵北海港参加运输，“终岁行驶香港、海口、北海，并无间断”。

航运业的发展，促进了北海贸易的畸形繁荣。1912-1921年10年间，北海贸易进口总值为1761万两关平银，出口总值为1417万两关平银，贸易入超为572万两，造成大量白银外流。可见，由于不平等条约的存在，北海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典型港口城市。